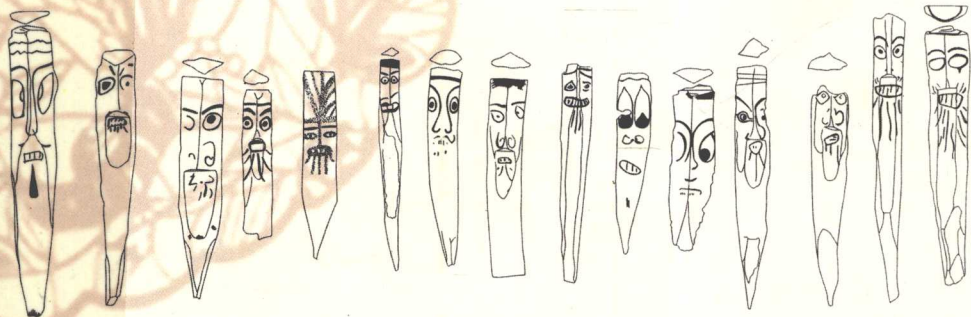


浙江民俗

中国民俗知识

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 编

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中国民俗知识

浙江民俗

顾希佳 编著



目 录

概述	1/1551
浙江生产民俗	4/1554
浙江商贸民俗	46/1596
浙江服饰、饮食民俗	62/1612
浙江建筑民俗	83/1633
浙江航运民俗	96/1646
浙江岁时节日民俗	101/1651
浙江人生礼仪民俗	119/1669
浙江家族村落民俗	139/1689
浙江民间信仰民俗	152/1702
浙江民间传说及艺术民俗	165/1715



概 述

浙江位于中国东南沿海，气候温和，土壤肥沃，风景秀丽，物产富饶。全省以山地丘陵居多，向有“七山一水二分田”之说。

浙江民俗的形成，源远流长。建德人是生活在这一带的古人类，距今5万年，对于他们的民俗我们不甚了解。不过从距今1万年以降，曾经是浙江先民的跨湖桥人、河姆渡人、马家浜人、良渚人的生活方式，我们已经可以从大量出土文物中大致获得认知。自有文字记载以来，我们更可以读到不少有关浙江民俗的描述，诸如“越人跣行”不穿鞋，“越人披发”不戴帽，“文身断发”，“水行山处，以船为车，以楫为马，悦兵而敢死”，“饭稻羹鱼，或火耕而水耨，果蔬蠃蛤，不待贾而足”，“会稽俗多淫祀，好卜筮”……表现出与中原地区迥然不同的风貌。

民俗的沿革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，由于自然地理、生态环境的不同，就有了“十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”之说。一些地域民俗往往会有着超时代的稳定性，但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。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，移风易俗也就从来没有停止过。



浙江历史上有过几次大的人口南移，就带来了许多中原民俗，中原民俗又与当地民俗不断碰撞、交融，有时候还会融入其他一些地方的，乃至域外的民俗，才终于形成了浙江民俗今天这样的璀璨风貌。

浙江内部，民俗的差异也很大。杭州是著名古都，南宋定都临安，奠定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园林城市的坚实地位，历来驰名中外。宁波、温州为闻名遐迩的港口城市，有着举世瞩目的商贸传统和开放进取的文化性格。浙北的湖丝和浙东的越茶、绍酒也久负盛名，名扬天下。舟山则是渔民聚居的地方。而在浙西南山区，广大山民的风俗习惯，历来又不同于水乡平原。浙江有33个少数民族，最主要的当推畲族，他们能歌善吟，尤以婚俗中的长夜对歌最为动人。凡此种种，风格迥异，千姿百态，共同描绘出浙江民俗的瑰丽画卷。

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，浙江各地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，传统民俗也势必受到强烈冲击，其中有的已经成为历史，有的正在濒临灭绝，或是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。为了保护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留住这些弥可珍贵的记忆，维系我们民族的文脉，弘扬优秀的民族精神，发展文化的多样性，我们有责任对传统民俗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，并且通过各种方式，广为宣传，以增强我们的自豪感和自信心。

入境问俗，同样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好传统。要了解一个地方，认识那里的民众，跟他们交往，不观风不察俗是不行的。不仅是问俗，还要入乡随俗，只有这样，才能真正成为当地民众的知心朋友。这也是当今社会文化交流日趋频繁所带来的一种新趋势。出于这样一种目的，今天的人民也就比任何时候都要关心各地的民俗风情。

《浙江民俗》这本小册子，正是出于这样一些思考，才进入写



作的。限于作者阅历与学识，限于篇幅与体例，这个小册子对于浙江民俗各个门类、各种事象的介绍还只能是十分粗浅的，管窥蠡测，挂一漏万，还望广大读者和行家批评指正。



浙江生产民俗

稻作生产中的知识与迷信

浙江的稻作生产历史，一直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。长期以来，我们的祖先积累起了一整套宝贵的稻作生产技能与知识，比如二十四节气，便是人们掌握农事季节的科学依据。农谚说：“打蛇打在七寸上，庄稼种在节气上”，人人都懂得“不误农时”的道理。长期以来，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农活，农民心里都有一本账。

至于这些农活应该怎样去做，这中间又有什么讲究，祖祖辈辈也早已积累起了宝贵的经验。听听民众间口耳相传的大量农谚，你便知道这里边的学问有多深了。“儿要亲生，田要深耕”。“一年四季在于春，早作安排迎春耕”。“田要肥，隔年犁”。“冬耕



深一寸，赛过上回粪”。“庄稼百样巧，肥是无价宝”。“种子年年选，产量节节高”。“娘好囡好，种好苗好”。“黄秧种瘦田，活转大半年”。“雨打秧田泥，秧苗出勿齐”。“种田勿除草，肚皮勿得饱”。“有稻无稻，要看肥料”。“深水活苗，浅水发棵”。“禾似葱，要防虫”。“水稻水稻，无水要翘”。“不怕田瘦，只怕田漏”。“早稻要抢，晚稻要养。”像这样言简意赅却又包含着真知灼见的农谚，我们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来。这些农谚总是在教育着人们，只要掌握一定的规律，多出力，多流汗，辛勤劳作，就能迎来丰收。这当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知识的领域。

不过我们又必须指出，在这一带的历史上，常常又会出现许多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，人们在经过一番努力而终于束手无策的时候，往往又不得不祈求神灵的保佑，或是试图用巫术、占卜术、禁忌这样一些迷信手段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。很明显，这里还存在着一个迷信的领域。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无奈，今天的人们应该客观地承认这一事实，并且予以足够的理解。

比如说，历史上频繁袭来的大旱和大涝，就曾经是当年的农民所无法抗衡的天灾。怎样在干旱年成求雨，当年在这一带最常见的就是向龙王祈祷。

祭龙祈雨，古已有之。《淮南子》云：“土龙致雨”，高诱注曰：“汤遭旱，作土龙以象龙，云从龙，故致雨也。”可见殷商时代已有土龙祈雨的习俗。后来又逐渐演变为舞草龙、舞龙灯的种种习俗。佛教传入中国，佛经上称诸大龙王“莫不勤力兴云布雨”，再加上唐宋以来历代帝王不断封龙神为王，于是又演化出龙王崇拜，遍及各地。

浙江一带祭龙祈雨的具体做法甚多，有到龙王庙烧香，抬去丰厚供礼以示虔诚的；有将龙王神像抬出来四处巡游的；有请来戏班子为龙王演戏娱神的；有扎制泥龙、草龙、布龙作舞蹈表演



的；有在求不到雨时把龙王神像抬出来，放在烈日下曝晒以示威胁的；有请僧道举行大型法事以示虔诚的……历史上有关求雨的风俗，五花八门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据典籍记载，杭州孤山一带在唐代就建有嘉泽庙，祀奉钱塘湖龙君，每年春秋，都有隆重祭祀。到了五代吴越国，又具表赐封钱塘龙君为广泽龙王。南宋绍兴年间庙迁到宝石山麓，又称水仙王庙。

此外，龙井和吴山二地，也都有龙王庙。龙井的龙王庙大约建于宋代，称惠济庙，有秦少游撰写的《记》，米元章书。吴山的龙神庙，清康熙帝有亲笔题书“灵佑安阁”匾额，身价自然也就愈发高了。

旧时求雨，倒并不一定非要向龙王祈求不可。在古人看来，似乎许多神灵都有降雨的灵验，法力无边，只要虔诚祈祷，他们也是会照应黎民百姓的。

我们在《吴山伍公庙志》里读到两篇祈雨的祭文，居然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杭州做太守时所作。由此可见，当年求雨，太守要到伍子胥庙里举行祈祷仪式，也已形成惯例。伍子胥是潮神、水仙，也与水有关。

在宋代大学者洪迈《夷坚乙志》卷13上，又有《法慧燃目》，却说南宋时期朝廷求雨，是向观音菩萨祈祷的。

据说这事发生在南宋绍兴五年的夏天。当时杭州一带大旱，朝廷派出官员到各地祠庙去祈祷，都没有用。又派临安府尹到上天竺，在法惠寺设观音道场，祈祷三七二十一天，还是不下雨。当时有个高僧潘法慧决心焚目，企图以此来感动上苍。他把一颗铁弹放到烈火之中煅烧，然后把这颗烧得通红的铁弹放进自己的右眼眶。这时候果然出现奇迹，刹那间大雨倾盆，旱情便得以解除。这个故事可能有虚构的成分，我们已无法详加考证，不过当



年之所以产生这样一个故事，其历史背景还是真实可靠的。

向观音求雨，后来居然也就成为了传统。这在《天竺志》中就有明确记载。说是明景泰六年夏天，“两浙苦旱，禾稼将槁，四民彷徨无措。时镇守阮公，会藩臬重臣与兵部尚书孙公等，斋戒沐浴，徒步亲诣上天竺寺。奉迎圣像至山林，建坛祷雨，即时阴云四起，至日晡，甘雨大注。”这说明向观音求雨在当时几乎已经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了。当年观音塑像中，有一种称为“洒水观音”，呈现在大众面前的正是这位女神手持净瓶正在洒水的形象。想来这个形象曾经打动过不少人的心，从中幻化出观音赐雨的感叹，也就十分方便了。
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当代在疏浚西湖时居然还曾发现过五代吴越国王钱缪、钱弘佐、钱弘俶在位时投入西湖的五枚“投龙简”，成为当年求雨的又一实证。龙简上，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段祭文：

今以时怕秋仲，遍诣灵踪，展投龙设醮之恒规；申行潦潢污之薄礼。

意思是给龙王送去一份辞意恳切的公函，希望他能够顾全大局，给老百姓降雨救旱，如此而已。这种风俗还可以追溯得更久远些。据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》卷4提到，明正统年间有人淘龙井，得到古代投入龙井的一些铁牌，最古老的，居然上面凿着吴赤乌年号，说明早在三国年代，在西湖龙井就已经有投龙祈雨的风俗了。

还有一种求雨风俗更加奇特。清代杭州作家杨文杰《东城记余》卷下《景隆八发》，转引郎瑛《七修类稿》，说嘉靖癸亥（公元1563年），杭州府求雨，就曾派景隆道士往富阳龙门山“取龙”。



所谓取龙，实际上是到山上的池潭里去抓一只青蛙、四只虾回来，便以为它们是龙的化身。据说甚为灵验，后来果然“雷雨交作，淋漓遍体，咫尺不可辨也”。这里当然纯属巧合，并无任何科学依据。不过在历史上，这种风俗曾经颇为盛行，则也是事实。人们以为高山上某个池潭中的水生物，诸如蛙、虾、泥鳅之类，是龙的化身。举行一定的仪式，向它们祈求，也就是所谓的“祈龙求雨”了。现代作家巴人在《莽秀才造反记》一书中，对于宁波一带历史上“祈龙求雨”的习俗，就有过颇为生动的描述。

旱灾可怕，水灾同样可怕。如果老天连续不断地下雨，到处一片汪洋，自然又该呼天抢地起来。这时候人们一心要做的，就是求晴了。求晴习俗今天已十分罕见，不过在一些老人的记忆里，却依旧时时闪回。比如，有的地方会剪一个纸人，一般是女子形象，让她手持一把扫帚，然后去倒着挂在屋檐下，意思是要她去扫天上的雨点，这显然是古老巫术的残存。还有的用黄表纸剪七个和尚头，倒贴在水缸脚边，并且焚烧纸香。据说这里的和尚头象征着龙，意思是要让龙吃点苦头，惩罚惩罚它，让它别再下雨了，说起来还是一种巫术。有的地方则烧火生烟，以为烟升到天空，也会感应止雨。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

除此之外，旧时对于虫灾的抵御也往往有些无能为力。当年在浙江乡间可以见到大大小小的刘猛将庙，人们信仰刘猛将这个神灵，也就是因为据说他是个治蝗虫的英雄。

这一带稻农心目中的神灵是个很庞杂的体系，还有一种“五谷神”，也值得一提。旧时，每年的六月初一这天，这一带有“烧田头”习俗，又称“请五谷神”。人们用锄头挑着两只篮子，一头放香烛、黄表纸；一头放酒、饭、豆腐等供品，还要加一盘“米筛爬”。这是用面粉、红糖、发粉揉和后放在米筛里做成的食品，形如海参，香脆可口，据说是用来预兆丰收的。人们来到田头，



逐丘祭祀，同时把田缺加高。在“烧田头”时，习俗以为挑篮子必须用锄头而不可用扁担。祭祀结束，全家吃“米筛爬”，也是颇有情趣的。

开镰收割第一丘稻时，人们又要虔诚地祭祀五谷神，同样在田头祭拜。开镰这天的伙食也格外讲究。人们到了田头，总要先吃点心，再下田收割。割稻也有禁忌。人们相互告诫，脚不可搁在稻桶上，不可吹口哨，不可戏闹，不可说“怎么割得这么慢？”“怎么割不完啦？”一类的话。农家开镰后第一次吃新米，俗称“尝新”。各地做法不一，不过一般都要在这一天用新米饭祭祀五谷神、仓神、天地，有的还要祭祀祖先。祭过神灵，然后再让全家人尝新。

这一带的稻农还要给稻谷过生日。一般以为正月初八是谷生日，五月二十五日是五谷神的生日，八月二十四日是稻生日，九月十三日是稻箩生日，在这些节日里都有相应的活动。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通过以上这样一番讨论，我们对于浙江稻作生产中知识与迷信这两个领域的由来，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，便有了大致的了解。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把握传统风俗的本质特征，显然也是大有帮助的。

开秧门与关秧门

农谚说，“清明浸种，谷雨落秧”，这其实就是浙江民众每年农事的第一张日程表。这一带的稻作生产，在大田插秧之前，总是先要培育秧苗，也就是俗称的“做秧田”。而在做秧田播种之前，则又必须先浸种。浸种通常在清明，所以说清明开始大忙，



是名副其实的。

旧时，还要选个吉利的日子浸种。不过尽管如此，“不违农时”的重要性人们都还是十分清楚的。所以到后来，一般农家也就不选什么日子，而总是安排在清明前后浸种了。一般从浸种到落谷，也就是播种，这中间大概又需要半个月时间。

习俗以为，播种必须在下午。人们以为上午播种，谷子是会浮起来的，这其实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。习俗又以为下谷种的人必须吃得饱，这样谷种才下得均匀，将来的秧苗也会茁壮。这个习俗也有些玄乎，不过却是对劳动者的关怀，应该说还是蛮提倡人文关怀的。

旧时，下谷种之后，农家还要用三炷香、三根黄荆柴，外面包上黄表纸，去插在秧田的田缺边，祭祀田头土地，祈求神灵的保佑。同时还要在田中插上一根竹枝。这样做，一则是用来向别人表示，这里已经下种了；二则还有驱赶鸟雀的功用。每当微风轻拂竹枝，便会发出沙沙的响声，鸟雀以为有人在守护田头，就不敢来光顾了。也有的农家干脆扎个稻草人，让它头戴破草帽，手持破蒲扇，“站”在那儿守护秧田，于是又成了这一带乡间的一道风景线。

下谷种以后，春耕大忙步步紧逼。当年这一带又有一种习俗，长辈们会把已经成家的儿孙叫到自己房中睡觉，以避免房事。这里有着某种禁忌的意味，又可以理解为是长辈要叮嘱儿孙保重身体。不过这毕竟有些过分，所以这条规矩后来也就慢慢地被人们遗忘了。

插秧种田的第一天，被人们形象地称



图1 插秧 原载〔明〕
邝璠《便民图纂》



之为“开秧门”。自然又是一个要认真对待的日子。

什么叫“秧门”？大凡拔秧的时候，总是要把秧苗扎成一个秧把，便于搬运。将两只手拔的秧合拢成一个秧把时，自然而然会留下个缺口。将来打开秧把播种，也就总是从这个缺口入手，十分方便。这就是人们所谓的“秧门”。不会拔秧的新手，扎成的秧把没有这个“门”，俗称“一把头”，分秧容易乱，旧时还会被老人认为是不吉利的呢！

“开秧门”也要选个好日子，旧时有“二八不开秧门”的说法。这一天，还要带上香烛到田头去祭祀一番，也有上土地庙祭祀的，总之是祈求神灵保佑的意思。这一天的饭菜也总是做得特别丰盛，一般会一天吃四餐，为的是让干活的人能够有力气。有条件的人家还会准备酒肉，俗称“种田酒”、“种田肉”。有的地方习惯在这一天烧一条黄鱼，或是蒸一个鲞鱼头，象征种田有想头。还有肉烧蛋、梅菜烧肉这样一些菜肴，用来款待种田人。上午9时左右，还要吃点心，往往是白水糯米粽，再蘸些白糖，这也成了一种饮食习俗。

下田插秧，总要请技术最好的“秧师傅”先下田，称为“开趟子”，也就是给大家先做个样子出来。这关系到将来整块田稻苗的布局是否合理、美观，还是蛮有道理的。

插秧有禁忌，习俗不准用手去接秧把，也不准把秧把抛到别人身上去，被秧把抛中的人会以为自己倒霉，要当面骂一声“驱邪！”或是那个不小心闯祸的人要主动喊一声：“喔，今天要交好运了！”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忌。拔第一株秧时，要



图2 耕田 原载〔明〕
邝璠《便民图纂》



先用秧根擦擦自己的手，并且不准开口说话。否则的话，习俗以为此人的手要伤筋痛，俗称“发秧疯”。插秧的时候，相互之间还不可以随便传递秧把，据说这样做会使这两个人成为冤家。

习俗要求，当天拔的秧要当天种下去，不能隔夜。如果种完了田还有秧苗多出来，通常不可以乱丢。有的地方习惯把秧苗一把把地插在田边，这种做法倒还是蛮有些道理的，以后耘田时倘若发现缺株，正好可以到田边去拔一些来补株。有的地方还会拿几把多余的秧苗抛在自家屋顶上，以为到了夏天屋顶上就不会生毛辣虫了。人们还相互告诫着不能用多余的秧苗喂牛，据说牛吃过秧苗，将来它就会去吃稻禾了。不难发现，上述种种禁忌中间，有的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，而有的则蕴含着某种生产经验，它们在当年混杂在一起，统统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，让人们觉得畏惧，这才得以世代相传，成为大众不得不遵循的一种习俗惯制。

插秧结束这一天，俗称“关秧门”。通常要求在当天下午三四点钟，太阳还没有下山的时候就完工。如果来不及，则老早就要请人来帮忙了。倘若到了天黑，还有一小块田没有插好，俗称“开天窗”，那又会被说成是很不吉利的事，据说会连带着这一年里许多事情都不顺利了。

“关秧门”表示插秧这道工序的顺利完成，大家都会松了一口气。有的地方，在关秧门的第二天，男主人要上附近的茶馆去喝茶，轻松轻松，俗称“吃汰脚茶”，表示前几天一直打赤脚在泥浆里讨生活，现在则可以洗干净脚穿上鞋袜了。出嫁的姑娘则准备抽空回一趟娘家，俗谚“插落黄秧，望望爹娘”，说的就是这种风情。



图3 收割 原载〔明〕
邝璠《便民图纂》



还有的地方，年轻人喜欢在拔掉秧的秧田里相互泼水、泼泥浆，嬉闹一番，即使身上沾满了泥水，也不会生气。人们称这种风俗为“糊秧门”，平日里不许这样打闹，只有在“关秧门”这一天可以破例，据说也是为了图个吉利。

稻作农具话旧

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我们的祖先早早就知道了这个道理。为了“利其器”，不知道有多少人为此动过脑筋。回顾这一带稻作生产中曾经被使用过的农具，以及当年使用这些农具时所形成的一些习俗，我们会进入一个饶有趣味的领域。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，这些古老的农具，似乎也有着某种特殊的吸引力。

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提到过“火耕水耨”。有人解释为是先放火烧掉田间杂草，然后播种。禾苗和杂草一起长大，苗高而草低，再放水淹灌，利用水来除草，草死了，稻禾才得以成长。这样一种粗放的生产方式，在边远的少数民族中间偶尔还可以见到。《越绝书》中则提到“鸟田”。有人解释为是让鸟去啄草根，捉虫，鸟粪又可以肥田，这是利用动物的天性来帮助稻作生产的一种古老习俗。然而这一类典籍文字都有些语焉不详，恐怕还是要配合着出土文物，才能把事情搞清楚。

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耜、石刀和水牛遗骨，是浙江先民早期稻作生产的重要物证。这种骨耜是用偶蹄类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做成的，肩部穿有横开的长方形孔，正好可以绑在木柄上。当然，当年的木柄早已烂掉，今天只能是猜测而已。如果这种猜测能够成立，那么骨耜就是一种翻土工具。这有点像今天还在用的铲子。



翻土时，翻起的土块在前，未翻的地在后，翻土的人要向后倒退着走。这和今天常见的用锄头翻土的情景正好相反。所以专家们称它为“耜”，而不能称它是“锄”。

这时候还未见“犁”，不过却已经有水牛遗骨了。有人解释，可能是当时的人让牛在泡着水的田里来回踩踏，把草叶草根都踩到泥下，把泥水踩成烂糊状，然后就可以播种了。据说海南岛的黎族同胞大约在100多年前也还在使用这种“牛踩田”的方法。可见以为这一带的先民曾经也有过“牛踩田”习俗的猜测，还是可以大致成立的。

良渚文化的出土文物中已经出现了石犁和耘田器。这说明那时候这一带已经出现犁耕。当然，这和后世的牛耕田还不一样，有人说，这种石犁一般是用人来拉着犁地的。不过它要比耒耜锄土效率高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也有人则大胆猜测，当时也可能已经开始使用牛耕了。

夏商周时期，出现了青铜做的农具，它比骨器、石器都要先进，也为后来出现的铁制农具铺平了道路。这一带出土的青铜农具，有犁、锄、削、耨、锛、铲、镰、耒耜、刀等，可见已经初具了规模。

到了汉代，铁制农具面世，便取代了铜制农具。这时犁耕已经相当普及，石磨也开始出现。到了三国时代，马钧又将手摇翻车改进之后用于农业，这就是后世水车的雏形。

唐代，陆龟蒙有《耒耜经》传世，那里提到的这一带使用的“江东犁”，和后世流行的水田犁已大致相仿。当年的江东犁由11个部件构成，其中犁铧、犁壁是铁制的，其余9个部件木制。农具的精细为稻作生产的精耕细作创造了条件，自不待言。

宋元时期，农具实现了第二次大变革。元代王祯《农书》中提到的不少农具，诸如犁、耙、耖、牛鞭、长铧、铁、铧、耘